

在莫言的文学之路上,有几位诗友或许是他永远不能忘怀的。

毛兆兕也许是最早发现了莫言的文学才华、最早扶持莫言的人。莫言来找毛兆兕时只有20来岁,莫言总共在《莲池》(后来改为《小说创作》)上发表了6篇文章。

莫言刚练笔时,往北京的大刊物投稿都没回应,看到手头有本保定出的《莲池》,于是就往那儿寄。寄过去,退回来;再寄过去,又退回来。这样往复几次,终于有一天,编辑来信约莫言面谈。

这说明有希望了,他激动得一夜没合眼。第二天刚亮,他就请了假乘头班长途车往保定市区赶,在离“总督府”不远的巷子里找到莲池杂志社。头一次进编辑部的门,他一个屋子一个屋子打听一个叫毛兆兕的编辑。一个编辑把莫言引到毛兆兕坐的位置说:“你就在这里等,他家远,一会儿就到。”莫言一边看着桌上的稿子,一边听着各种进门的声,等待毛兆兕的到来。

半个小时的样子,莫言等来了毛兆兕,高高的个子,瘦瘦的,身着一身中山装,莫言站起等待他的开场白。毛兆兕从抽屉里拿出莫言的稿子说:“这稿子有一定基础,拿回去再改一改。”莫言道谢后匆匆离开了编辑部。

回到部队,马不停蹄,赶紧改稿。改了又改,很不中意。莫言干脆又另起炉灶写了一篇新的小说。送到编辑部,毛兆兕说还不如上一篇稿子好。这话对于一个文学新人来说应该是有打击的,但莫言还是硬着头皮表示一定改好。

又回到部队,他把这两个稿子揉到一起写出一稿,又送到编辑部。

再次回到部队等待。很快,毛兆兕来信说这篇稿改得不错,准备用——《春夜雨霏霏》上了《莲池》头条!

1983年,莫言给毛兆兕寄去《民间音乐》,那是莫言刚刚尝试采用西方幽默和魔幻现实主义手法创作的。毛兆兕对传统文学手法较熟悉,对此文有点看不懂,而同事钟恪民则在审美上有独到的眼光,老毛便把文章给钟恪民看。钟恪民看完文章后拍案叫绝:“这是一篇绝好的文章!”

毛兆兕生前收到过莫言4封信。在这些信里的最后具名里,莫言都以“学生莫言”自称,其谦虚态度跃然纸上。第一封信中这样写道:“毛老师,您好!您及编辑部诸位老师为我这个无名小卒的极不成熟的作品费了不少心血,我惶惶不安。惭愧!在你的扶持下,我的作品即将见诸刊物,这对我是一个极大的鼓舞,极大的鞭策,我一定不辜负您的期望,不断地努力,争取有新的进步。”

在这几封信里,钢笔字体刚健有力,力透纸背,语气谦虚恭敬。在1983年8月20日的信里,莫言因为其《大路》一文在《莲池》发表后被《小说月报》转载,莫言表达了要把《小说月报》稿费寄给毛兆兕夫妇的意思。他写道:“《大路》一文从修改到出版,您付出的劳动并不比我少……您是我的父辈,我的文学启蒙老师,我有义务为您的健康作出自己的努力,稿费(转载费)——您的劳动报酬,应该变成滋补品来促进您和林阿姨的健康。假若,您硬要把钱寄来,那会使我很伤心的(如果您硬要寄来,我也要变法儿还给您)……您看,我这个当兵的有点直来直去的劲头。”在1984年1月16日的信里,莫言写道:“这次去石家庄参加《长城》组织的笔会,与一些青年作者和编辑部的老师们聊了聊,感到收获很大,心里憋了一股劲,回来决心在1984年里努力拼搏。”他还在这封信里写道:“在过去的几年里,如果说我取得了一点成绩,那是与老师您的帮助分不开的,老师对我的帮助我永远不忘,如果没有您的帮助,我肯定还在痛苦中徘徊。”紧接

着,在不到一个月后的1984年2月11日莫言写给毛兆兕的信中,莫言这样写道:“老师,这几年在您的帮助下,实事求是地说是我有一点进步,我永远忘不了您远路风尘去易县看我,忘不了放下家中的急事陪我去白洋淀深入生活,忘不了您去医院探望我的病情——您当时的神情至今还会使我想起来就鼻子发酸。可惜我想不出来怎样来感激您。我大概只能以拼命写作、多出成果、早日成材来报答您了,我想这也是您所希望于我的。”这些信写得情真意切,感人肺腑。我把这些信件中的段落选出一部分,让有心的读者自己来感受莫言和毛兆兕非同寻常的师生情谊。也难怪,已经成名的莫言在多年后的1998年《长江日报——文学周

■讲述

有诗友相助的文学路

□杨永革

刊》第47期《我是从《莲池》里扑腾出来的》中发出“我永远不敢忘记毛兆兕老师……《莲池》是我永远的圣地”的感言。

我们吧时间拉回到1979年。那年莫言从山东黄县刚调到河北保定不久,在《莲池》发了几篇小说后在部队引起很大的反响。一天,时任政治部副主任的肖里干和宣传科科长到训练大队视察工作。大队政委向肖里干汇报工作时提到了莫言。政委说,这个战士,水平还是蛮高的,能讲政治,能讲数学,而且发表了小说,被地方的刊物认为是很有潜力的青年作者。作为战士,25岁已经很大,这是个人才,能不能作为特殊的情况照顾一下?肖里干就对宣传科长说,老王,我们明天去听这个战士讲课,不要提前告诉他。晚上,大队政委让莫言做点准备。莫言把课程调整后讲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他最熟悉的一节。两个班的大课,100多人。开始莫言有些紧张,但很快就调整过来,叽里呱啦从头讲到底,嗓门儿大得让别的教室都抗议。宣传科长对政委说,水平果然不低,假以时日,前途无量。几天后,肖里干拿着莫言的小说,找到总参政治部干部部,说这个战士确实有水平,不提太可惜。总参政治部干部部就让他们打个报告吧,我们特批。等暑期休假回来,莫言就接到了提干的命令。提干时间是1982年7月28日。

莫言提干后继续当政治教员,但心思就慢慢往创作方面转,与保定文学界建立了很好的联系。1983年6月,上级调莫言到宣传科报到。莫言思想一时转不过来,就给干部科江干事打电话,请他帮忙不要调他走。江干事不但没帮忙,还劝他服从组织安排,还送到了北京刊物更多呀,北京的天地更宽广啊,你老在保定有什么出息啊。莫言一想是这个理儿,就愉快地来到北京。

到了宣传科,莫言主要负责干部战士的理论教育工作。为了摸底,科长让莫言写了一份工作简报。不久这份简报传到了已升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的肖里干手里。肖里干把莫言叫到办公室,说你这篇简报还是写得不错的,但逻辑上有的一些地方不大通。武汉大学历史系毕业的他就给莫言讲逻辑,大概说要管小概念,大词要管小词等。他还提醒莫言要谦虚,要好学。他讲到,

一次他曾带几个干事参观历史博物馆,面对展品滔滔不绝地讲历史。他看见身后站着一位老者面带微笑听着就更来劲儿了。讲完后,老者说,解放军同志,你学问很好,但有两个地方讲得不对,朝代搞错了。肖里干就问他尊姓大名,这位老先生就说:鄙人沈从文。

三年前,徐怀中带领30多个文学新生开创了新时期军旅文学的新局面,借此也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莫言就是其中之一。在新学员见面会上,徐怀中对莫言的小说《民间音乐》大加赞赏,还说莫言的文化考试是全班第二名,专业课是第一名,但如果当时文化课不及格,这个干部

他也要!

《金色的红萝卜》写出来后,莫言拿给徐怀中看。第二天,徐怀中告诉他,这篇小说非常好。不过,徐怀中把《金色的红萝卜》改成了《透明的红萝卜》。在中国作家杂志社组织的座谈会上,徐怀中亲自主持,对把莫言推向文坛起到了重要作用。后来,莫言发表了《爆炸》等一批小说,获得了第一届《大家》文学奖和第二届冯牧文学奖。徐怀中对自己的学生不断进步感到甚为高兴。

徐怀中一直认为莫言是天才,是中国也是世界当代优秀的作家。在1996年有的人“无限上纲”重批莫言时,徐怀中在《大家》第一期写道:

“从黄河里舀起一碗水,不难看到碗里的泥沙。不过我们站在河边,首先感到的是扑面而来的冲击力和震撼力。”

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很多记者要采访徐怀中,都被他婉拒。莫言文学馆近期扩建,馆长毛维杰找到他,请他为新馆开馆写几句话。徐怀中高兴地提笔写道:“我们不难得知莫言小说世界的源流。家乡风土人情、工匠农巷、神话传说、地方戏曲等等。凡此古来农耕文明的遗风,便是他的能源宝库。多年劳动生活积累,以及蕴藏丰富的儿时记忆,任他信手拈来,取之不尽。以高密东北乡那片红高粱地为坐标,莫言测定了他未来的文学走向,也就此明确了他的‘草根’写作立场。矢志不移,坚守至今。”

1986年,莫言在军艺要毕业了,一些小单位都想调莫言到他们那里。57303部队的领导找到总参政治部文化部部长李静:我们渺小,是不是把莫言放在文化部?李静第二天就到莫言所在单位考核并决定调莫言到文化部工作。莫言的直接领导不想放,想留他当宣传科长。李静就说:“科长成上万,谁都可以当,莫言就一个!应该把他放到更能发挥作用的地方!”没过几天,徐怀惠副总参谋长特批,莫言到文化部任职。尽管过了几年,有的单位还想把莫言“挖走”。李静在全军文化工作会议上郑重地说:“我这里表明一个态度,大家不要再打莫言的主意!”由此可见,李静爱才之深。

爱才还要管才。李静平时从政治思想到创作上尽可能关心帮助莫言。凡是全军性重大创

作采访活动都有莫言的身影;总参创作笔会都要莫言给年轻人讲课辅导。军事五项运动队、抗洪抢险一线、英雄模范身边、改革开放前沿都留下了莫言的身影。

李静家住军事科学院,为中午休息,组织上在平安里给她安排了一个单元房间。当时单位住房紧张,莫言只能和几个人住在仓库里。由于没有空调,夏天非常热,有一年看世界杯足球赛直播,只好跑到楼下电影队去看,在地下铺个凉席看一会儿睡一会儿,睡一会儿再继续看。李静得知莫言爱人要从山东来探亲时,就把她的房租给莫言住,自己每天中午就在办公室沙发上休息。

李静是个开拓型的领导干部,她组建的“女子军乐团”、“长城”等5支战士艺术团闻名军内外。她曾与我说:“总参是全军的军事领军机关,历届总参首长都非常重视文艺工作。咱们设立一个总参文学奖。我提议,杨总长的《横戈马上》、马云鹏的《最后一个冬天》、莫言的《红高粱》都达到很高的水平,老中青三代都评为一等奖。”经军内评委讨论,一致通过了李静的建议。当然也有个别人找到李静说,老同志那么多,让年纪轻轻的莫言获一等奖,合适吗?李静说,合适不合适不看年龄,要看作品质量。没过两年,文学奖扩大范围改为“文艺奖”,李静再次提议莫言作品获一等奖。当《红高粱》红遍世界时,李静报上级批准,给莫言记二等功一次。李静对莫言最大的帮助是从不干涉他的创作,对他不断上升的创作势头给予肯定。去世多年的李静若能知道自己部下今天的业绩,一定会非常欣慰的。

1988年至1991年,莫言在北京师范大学攻读研究生。当时54岁的童庆炳是北师大教授、博士生导师,同时还是中国作家协会理论批评委员会委员。根据中国作协的愿望,要给中国青年作家办一个能够拿硕士学位的作家研究生班。最终教育部同意中国作协的鲁迅文学院与北师大中文系合作,举办正式的有学历的研究生班。这个班由童庆炳和何镇邦出任总辅导员,童

庆炳系统地给他们开设了“创作美学”课。他经常教育莫言这批学生要做到“有待乎内,无待乎外”。“有待乎内”,就是通过自己长期的研究,内心有所收获,有所收获,这是一种内在的收获,这是最重要的。“无待乎外”,就是做学术研究要能够正确面对外界一切,坦然面对风雨,淡然面对名利。经过努力,最后大家都拿到毕业证书,莫言的导师就是童庆炳。

2013年1月22日,莫言来到北师大,他和童庆炳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互相拍着肩膀。莫言的举止,多了几分洒脱,少了几分拘谨。他回忆起了1988到1991年在北师大读研究生时的情景,他认为那几年是一段很有意义的光彩,但对于那时没有抓紧学习文学理论和英语等课程感到遗憾。他高兴地接过北师大校长董奇递过来的礼物——他读硕士研究生时的全部档案。成绩单啊,论文评议书啊,年轻的人学照片啊,所填的各种表格啊……他收到这份礼物很高兴,说:回去要好好看看。

莫言对老师充满敬意。他直言,老师就是老师,学生就是学生。在学生困难的时候,挺身而出;在学生取得荣誉的时候,退到身后。正是童庆炳的鼓励帮助,莫言才得以完成硕学位论文,可以在书的扉页上,写上自己是北师大文艺学硕士。

说到莫言的硕士论文《超越故乡》,莫言私下说,大半是童庆炳替他写的,童庆炳则认为不符合事实。事实是对其论文的题目、内容、确有提示和指导,但是论文的整体,特别是那些思想,是完全属于他自己的。莫言在他的论文里,第一次提出“创作的生活根据地”问题。他提出要扎根故乡,又要超越故乡。他提出他这一生的创作,就是要“建立高密东北乡的文学王国”。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童庆炳作为他的老师,拒绝各种采访,拒绝写文章,心里所有的就是“欣慰”二字。莫言获奖后给导师童庆炳写来一封信,他在信中说:“获诺奖确实係件大事,但绝没大到媒体渲染的程度。等尘埃落定之后,真正能够让一个作家青史留名的还是作品,对此我十分清楚。”

目,纵使弗兰德斯的内田野里,罌粟花遍地开放。”

这首诗写于1915年,在加拿大家喻户晓。它的作者,是以军医身份前往欧洲大陆参战的加拿大学者麦克雷中校。在一次战役结束之后,他亲手埋葬了朝夕相处的伙伴,凝视着盛开在十字架间一丛丛鲜艳的罌粟花,灵感如泉,随手写下了这首优秀的诗篇。

3年后,麦克雷也永远地长眠在这片土地上。此后每年深秋,万木萧疏的日子里,大洋彼岸的枫叶闹街头,便可见胸前佩戴着一朵朵鲜红罌粟花的人们走过,默默祭奠那些在战火中凋殇的英魂。

今日小城的阿拉斯,人口不过5万多。小城郊外,阡陌田野上,密密麻麻坐着成片的坟墓,埋葬了近4万名无家可归的英联邦士兵。弗兰德斯斯的罌粟花此刻在我眼前纷纷飘落,我读出了诗人厌恶战争、渴望和平的悲凉与苦衷。

傍晚到中餐馆里吃了一碗青菜汤面后,踩着湿漉漉的鹅卵石,穿越雨果广场,转入一条狭窄的陋巷。收了伞,抬眼便见一座高大厚实的木门。年代久远,紧锁的木门油漆剥落,早已难辨颜色。趴在门缝上窥探,依稀可见满目疮痍,断壁残垣。门旁铭刻的铜牌标示着,这里曾是罗伯斯庇尔故居。

在小城博物馆里见过他年轻时的肖像,温文尔雅,目光中蕴含着几分憧憬、几分羞涩,一派通情达理的书生模样。这时燃起了法国大革命烽烟的政治家,曾带领群众处死了上万名革命的対象,最终,自己也惨死在革命者垒砌的断头台上。200多年过去了,风云变幻,潮起潮落。后世的人们依旧对他的历史功过褒衷一己,难以论断。

恍然间想起了鲁迅的警句:“革命,反革命,不革命,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当作革命的而被杀于反革命的,或当作反革命的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并不当作什么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反革命的……”透得令人心悸。聊以自慰的,乃先生说的另一句名言:“惟独革命家,无论他生或死,都能给大加以幸福。”

他为战争奉献出宝贵生命的人们,亦如是。君不见罌粟花鲜红似血,年年秋风四起时穿街过巷地飘荡。后来的人们,也才能坐于小巷深处,安然地品味着可口的青菜汤面。

英伦三岛,有的来自澳大利亚和加拿大。这一条条遍布域下的古老的隧道,就变成了神秘的藏兵洞,隐蔽了3万多名在暗中摩拳擦掌的士兵。

1917年4月9日凌晨,神不知鬼不觉地,数万名英军从几米开外的地下突然冒出,奇袭德军阵地,打响了著名的阿拉斯战役。这次战役持续了39天之久,其惨烈状况,从双方军队高达16万、平均每日4000多的伤亡人数,到小城80%的建筑物均遭战火焚毁,便知端倪。

小城藏兵洞之曲折复杂,相较于南京城中华门内那排笔直宽阔的藏兵洞,绝不可同日而语。如无导游带领大家攀下旋、峰回路转,恐怕就如入迷宫,进去容易出来难了。隧道里的灯泡半明半暗,泛着幽幽的青光。照着渗着水滴的岩壁和残留着战地炊烟的灶坑遗迹,也照亮了悬挂在玻璃框中的几幅陈年旧影。一张张英俊中夹着稚气的脸庞,从岩壁上粗糙简陋的木架束上伸头探脑,朝着镜头微笑,似乎浑然不觉死神的翅膀已在头顶无声地盘旋。

玻璃框内,半页发黄的英文剪报吸引了我的目光。消息提及,小城人欢欣雀跃,感谢大批援军从天而降,其中还有整整4个师的加拿大士兵并肩作战,击溃敌军,胜利在望。

蓦地,我脑中闪过了一片鲜艳欲滴的罌粟花,伴随着朗朗的吟诵声,在隧道里嗡嗡回响:“在弗兰德斯斯的战场上,罌粟花随风飘荡,绽放着坟前的十字架,一排排,一行行。/这里,是我们长眠的地方。/云雀依旧在蓝天下勇敢地飞翔,尽管枪炮声淹没了它们的歌唱。/我们是阵亡者。/可瞬息前还活着,感受过黎明时的初露,观望过日落时的霞光。/曾经热爱,也被人爱过。/然而此刻,却静静地躺在大地上。/挺身而出吧,从我们僵冷的手中接过火炬,让它继续燃烧、发亮。/倘若你违背了誓言,我们将难以眼

记两位散文诗前辈

□王慧祺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曾专注于散文诗的写作和评论。期间,与柯蓝、郭风等几位散文诗前辈有过程度不同的交往,并因此留下了一些美好和温暖的记忆。

第一次见到柯蓝,是在1985年的夏天。当时他为筹建中国散文诗学会江苏分会来到南京。由时任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院长孔的王知千牵头,邀集在宁的江苏省散文诗作家共13人,组成了一个筹备小组。柯蓝召集我们开了个会,讨论了有关事项。这一年柯蓝已经65岁了,但身体很硬朗,气色很好。他讲话有很浓的湖南口音,抑扬顿挫里充满一个诗人特有的激情。

同年秋天,他和夫人文秋由扬州市文联秘书长许少飞等陪同,来到我工作的江都县城。两天里他马不停蹄地随我走了好几处地方:去一个叫作樊川的古镇,与农民文学社的文学爱好者们进行了一场气氛热烈的交流;到县里的中学给1000多名师生作了一场关于散文诗创作的讲座;还抽出时间来到我的小屋,看望了我的妻子和刚出生不久的女儿。当时的我大学毕业不久,面对他所做的一切,我有说不出的感动,深受鼓舞。我后来在散文诗写作上的发奋与不断探索,与柯蓝几次在报刊上撰文对拙作给予肯定密不可分。

时。他介绍了中国散文诗学会的良好发展态势:在25个省市区相继成立了分会;出版“黎明散文诗丛书”,推出了50多位散文诗作家的作品;编辑出版了一批散文诗研究的理论著作;除在广州出版开大报《散文诗报》外,还联络了国内数十家地方报纸定期或不定期地辟出“散文诗专版”,一大批诗人或散文家投入到散文诗这一文体的写作中来,其气象前景十分喜人。柯蓝对这支散文诗的写作队伍在当时中国文坛的方兴未艾所表现出的激奋之情,深深感染了我,回宁后我迅即写出了对他的专访,在我任职的刊物以及上海《文学报》等报刊上发表。

柯蓝写出了不少如《早霞短笛》一样明快向上的散文诗章,但我以为柯蓝对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散文诗的复苏与发展所作的贡献,还体现在他富有鼓动性和感召力的四处奔走的说教和推进上。一项事业的如火如荼确实离不开一位(或一批)具有奉献精神的活动家和推广者。

另一位令我留下极深印象的是郭风。郭风被称为是“一生都钉在散文诗十字架的人”,他一生所有的才情与心血都挥洒在了这方不寂寞的文学园地上。我第一次见郭风,是在1986年的散文诗年会上。他比柯蓝长两岁,那一年68岁了。他是一个特别安静和慈祥的老人,无论在会上或会下,凡向他打招呼的,他都会报以微笑,那笑容纯净而坦诚,甚或还有几分孩子似的羞涩。那次会议组织大家去爬峨眉山,头天住在了半山腰的清音阁上,我见他和李耕坐在靠窗的木椅上,静静地交谈着。那种从容、淡定和静谧里透出的安详,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仅仅因为这一次相遇,令我没想到的是,一年多后我却得到了郭风先生一次无私的恩泽。1988年春,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打算出版我的第一本少儿散文诗集,我斗胆将诗集的手稿寄给了郭风,期盼他为这本小书写篇序文。完全是一种初生牛犊的冒失之举,我自己也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回音。但没过多久,我收到了一个来自福建省作家协会的大邮包,拆开来,里面是我的书稿,还有郭风先生的亲笔信,以及他为我这本书写的序。在这篇后来发表于1988年10月8日的《文艺报》上的序文中,他不仅很细致地评析了我的具体作品,更对我整个儿童散文诗的发展现状以及出版方面的成果,从宏观上作了勾勒,给人以统揽全局、高屋建瓴之感。

在郭风面前,我是道地的后学和晚辈,且与他无任何私交可言,而他因何为我作序?我的理解是,这是一个对散文诗始终怀有崇敬之心、深切之情的人,你爱他所爱,所以他便视为知己,进而助你一臂之力,给你雪中送炭,指点迷津。

■行走

罌粟花下藏兵洞

□【加拿大】李彦

去年中秋前夕,赴法国北部出差,盘桓数日,颇长见识。

欧陆历史绵长久远,触目皆是千年掌故,与北美差异之大,自是不言而喻。

小城阿拉斯,旧译阿哈斯。鹅卵石铺就的广场坑洼洼,在霏霏细雨下光滑闪亮。灰褐色的教堂巍峨庄严,俯瞰着脚下鳞次栉比的绿窗红瓦。钟声敲响了,铿铿锵锵,穿透曲径通幽的小巷,在耳旁久久地回荡。

小城人引以为豪的游览胜地,当属城下星罗棋布的“藏兵洞”。步入雕饰精美、古色古香的市政厅大厦,绕过宽阔的前堂,便钻进了一条乱石凜立、阴暗潮湿的隧道。隧道始建于公元9世纪,掘入地下20米之深,长达数十公里,纵横交错,四通八达,俨然一座地下城。担任导游的法国女郎俏皮地笑着问,小城的象征物是什么?无人组织。女郎道出了谜底:老鼠。

据说,开凿隧道的初始目的,是为了获取建房的用石。几百年之后,这块平原发展成欧洲的粮食集散中心,人口逐渐增多。为防城市塌陷,12世纪时,开采停止了。隧道便被分割成一块块,改作商家与居民的储藏室之用,囤积谷物、葡萄酒等物品。

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时,这座位于法国北部边陲的小城,恰恰处于兵戎相见的主战场中心。于是,隧道的使命再次变迁,从而在人类军事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浓重一笔。

战火燃烧了两年之后,从1916年开始,小城里出现了一批来自新西兰的岩洞开凿者。他们对外声称,要把古老的地下隧道改建为艺术陈列馆。就这样,犬牙交错的层层隧道被凿通之后,连接为一体,并秘密地延伸到德军的阵地之下。

按照计划,一列又一列火车在夜幕的掩护下,源源不断地驰入小城,从全世界各地,悄悄运来了数不清的英联邦士兵,有的来自